

让「敬」的智慧照亮人的精神世界

修己以敬

□丁万明

事敬”等等，但“敬”的内涵也有所扩大，如子路问君子，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”这里是把“敬”作为修身的目标，作为判断君子与否的一个标准，成为一种道德准则。

在《孟子》一书中，有44处涉及“敬”，其中有25处讲的是对人的礼貌和尊重，如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，敬人者，人恒敬之”“用上敬上，谓之尊贵，用上敬下，谓之尊贤”等，孟子进一步深化“敬”的内涵，提出“陈善闭邪谓之敬”，就是说陈述善德，抵御邪恶就是“敬”，赋予其道德判断的功能，使其具有内心省察的含义。荀子则着重发挥“敬”的社会规范作用，在《荀子》中百余次论及“敬”，强调其在维护礼制秩序中的重要性。

《周易·坤·文言》里提出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这成为后来宋明理学提出“主敬”的心性修养功夫的依据，尤其是在宋明理学中成为心性修养的重要方法。《礼记·曲礼》开篇就讲“毋不敬”。春秋时期，“敬”的内涵则不断扩大，不仅包含心理状态和处世态度，而且也成为君子为人处世的一种德行，成为判断一个人的言行举止、道德品行的一个标准。

“敬”的理论在宋明理学时达到系统化、镇密化、深刻化，上升至道德修养的功夫，成为道德涵养的根本途径。宋代理学家将“敬”提升为心性修养的根本方法。程颢提出“诚敬并重”说，主张“敬”要自然适度；程颢则发展出“主一无适”的修养工夫，强调内外交养。朱熹集其大成，将“敬”阐释为“圣门第一义”，认为“敬只是一个畏字”，并创造性地将“敬”与格物致知相结合，形成完整的修养体系。朱熹还把“敬”与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”的思想，提出“主敬以立其本，穷理以进其知”，使“敬”的思想更加丰富和完善。明代理学家刘宗周提出“敬则诚，诚则天”的命题，使“敬”的哲学达到新的高度。王阳明则从心学角度指出：“敬者，心之本体”，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。

到了晚清，曾国藩将“敬”的修养落实为具体的人生实践，提出“主敬则身强”的著名论断。曾国

藩把“敬”的思想发挥至极致，“敬”成为他心性修养的五字要诀之一。他说：“内而专静统一，外而整齐严肃，敬之工夫也；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为承大祭，敬之气象也；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平，敬之效验也。聪明睿智，皆由此出。庄敬日强，安肆日偷。若人无众寡，事无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怠慢，则身体之强健，又何疑乎？”这种将道德修养与身心健康相结合的智慧，体现了儒家“知行合一”的实践品格。

在当代社会，“敬”的观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从个体到社会，从自然到历史，“敬”的哲学内涵为现代文明困境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思路。对自然的敬畏，能够遏制生态破坏，引导可持续发展；对历史的敬畏，可以抵御文化虚无主义，增强文化认同；对他人的尊重，能促进社会和谐，构建良性互动关系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：“在中国思想中，敬畏感并非源于对超验上帝的恐惧，而是对宇宙秩序的自觉认同。”这种基于人文理性的敬畏观，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伦理底色，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东方智慧。

实现“敬”这一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，需把握三个关键维度：一是内核与形式的辩证统一，如孝道的外在形式可因时而变，但敬老尊贤的精神内核应当传承；二是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，用当代语言阐释“敬”的核心理念，使其更易被现代社会接受；三是实践层面的创新融合，将“敬”的道德要求融入职业伦理、生态观念和社会交往之中。费孝通提出的“文化自觉”理论启示我们，唯有深入理解传统，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；唯有创造性转化，才能使古老智慧持续赋能当代社会。

从孔子的“修己以敬”到曾国藩的“主敬则身强”，再到今天的敬业精神与生态伦理，“敬”始终是一条流动的精神长河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，我们既要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根脉，更要以创新精神激活其生命力，让“敬”的智慧照亮现代人的精神世界。

《海学说》：玉不琢，不成器

□王杰

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史学家。他读书勤奋，才华横溢，笔耕不辍，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。《海学说》就是他在茫茫史籍中，结合自身的人生经验，留给他的次子欧阳奕的精神财富。

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。然玉之为物，有不变之常德，虽不琢以为器，而犹不害为玉也。人之性，因物则迁。不学，则舍君子而为小人，可不念哉？付矣。

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：玉石如果不雕琢，就不能成为器物；人如果不学习，就不懂得道理。然而玉石作为一种物质，拥有恒常不变的属性，即使不雕琢为器物，也仍然不损害它作为玉的本性。人的品性，会随着外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。人如果不学习，就会放弃成为君子而变为小人，怎么能不思考这个道理呢？这就是为父对你（欧阳奕）说的话。

玉石如果不经过雕琢与打磨，就不能展现光芒被人喜爱。人如果不能静下心来、不经过锻炼，就不能成为拥有高尚品德的君子或有所作为。玉有恒常不变的属性，但是人的心性会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人生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如果没有勤奋努力好学的习惯，很有可能会远离道业，由君子变为小人，不可不谨慎小心。人的一生，若是没有学习的目标、方向、习惯，难免会有迷茫和无助，缺少了学习的信仰，更会不知所措、遗憾空虚。

通过学习欧阳修的《海学说》，我们对“玉”与“人”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其中的名言，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”就是出自儒家经典《礼记·学记》，可谓是海学良言，发人深省，引人向善。

当今社会，物质发达、欲望泛滥，假如人们再不努力学习，就会碌碌无为、失去精神方向，更找不到幸福和快乐。所以，《海学说》中的警句名言其实是在帮助我们，时时提醒自己、反省自己，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和灰尘擦去，恢复我们内心本来的清净面目。我们努力学习读书，勤劳奋斗就是为了拥有更幸福和更有意义的人生。面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，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

家风熏陶，很容易走上邪路歪路。欧阳修在《海学说》中教育儿子要做个正直的人，要走正道，这对欧阳奕为官做人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。

《海学说》中指出“人之性，因物则迁”。与荀子所说的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是同样的道理，这就是“环境造就人”的意思。因此，父母在家庭中的言传身教显得弥足珍贵，孩子的行为都会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如果在一个家庭中，父母长辈有很多不良嗜好，都会深深影响到孩子的人格养成，例如抽烟、喝酒、赌博等。所以说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，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。

欧阳修的母亲郑氏，自嫁给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以后，一直跟随丈夫在外生活。宋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年）六月，欧阳修出生在父亲四川绵州推官任所。4岁那年，父亲调任泰州判官，不久便去世了。父亲生前为官清廉，喜欢结交朋友，乐于接济穷人，死后家里没有留下任何财物，穷得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地。转眼间，欧阳修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其他同龄孩子都进书馆读书去了，可郑氏没钱送儿子读书，心里非常着急。怎么办呢？郑氏非常清楚，连纸张笔墨都买不起，私塾先生就更加请不起了，所以还是决定自己来教儿子读书写字。没有课本，郑氏就把自己学过的诗文逐一回忆起来，教儿子读，教儿子背。郑氏正在为没有笔墨纸砚发愁时，突然有一天，她在河边洗衣服，飏飏的霜风吹得沙滩上的芦苇七零八落，被折断的芦苇秆把一片平整的沙地划得沟沟壑壑，似字非字，这给郑氏很大启发，她灵机一动，用衣兜从河滩上捞取了些许细沙，又折来几根芦苇秆，回家后，她把细沙装进一个大盘里抹平，就用沙盘当纸，用芦苇秆代笔，把手心地开始教儿子写字习文。欧阳修就这样在沙盘上跟着母亲一笔一画地学，反反复复地练，每字每句都要一丝不苟地熟读写好才肯罢休。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，很快爱上了诗书。每天写读，积累越来越多，很小的时候就已能过目成诵。随着欧阳修慢慢长大，母亲除了教儿子写字习文之外，还常常用他父亲为官处世的故事来教育欧阳修。欧阳修

在母亲的辛勤培育下，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，最终成为北宋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政治家、经学家、金石学家、目录学家和谱牒学家。他成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，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，被公认为北宋文坛领袖、一代文章宗师。

欧阳母“画荻教子”的典故家喻户晓，传颂古今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，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后学晚辈。这则教子典故，成为古今中外母教文化的典范，欧阳母也与孟母、陶母、岳母被誉为“中国古代四大贤母”。

正如《海学说》里所提出的“不学，则舍君子而为小人”，成为一个君子，是欧阳修毕生为学的目标。而他的父亲欧阳观，正是一个让他终生以之为学习榜样的仁厚君子。

欧阳观在世时曾任推官，经常处理案件到深夜。对于涉及老百姓的案件，他十分慎重，凡是能够依法从轻的，他都酌情从轻，这样的爱民情怀传给了欧阳修。

北宋景祐三年（1036年），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而仗义执言，被贬到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，有一次翻看架子上的陈年公案卷宗，发现里边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，把理屈的判为理直的，以黑为白，以真为假，徇私枉法，无所不为。夷陵这个小县尚且这样，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当时欧阳修便暗暗发誓，今后处理政务绝对不能疏忽大意、玩忽职守。为了兑现这个无声的承诺，他日夜操劳，事必躬亲，终于在“争论甚多”“官书无簿籍”“吏曹不识文字”的穷困小县里建立起一套严密有效的规章制度。

学在书中磨，人在事上磨。在夷陵艰苦的4年县令生涯，培养了欧阳修为民爱民的情怀，造就了欧阳修能吃苦、敢碰硬的不屈韧性。这些修养和情怀也是家训家教在他身上的体现，并通过《海学说》等文字传递给后人。

在辽西走廊的苍茫大地上，一座承载五千年文明印记的圣山巍然矗立。《周礼》载：“东北曰幽州，其山镇曰医巫闾。”自汉魏列祀，辽金置陵寝，明清隆秩典。其势南引碣石，北控龙荒，胡汉共祀，礼俗交融，实为塞外文明辐辏之地。医巫闾山是《周礼》记载的幽州镇山，也是多元文明交融的活态见证。她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，更是历史文化的交汇点。医巫闾山一带自古以来生活着多个民族，包括契丹族、女真族、蒙古族、汉族等，是多种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，形成了一部多民族交融史。

从各民族的祭祀看民族融合的开端

作为连接中原与塞外的地理枢纽，医巫闾山自舜帝分封十二镇山起便纳入一方镇山序列。汉代将其并入五岳五镇体系，到了隋朝，医巫闾山正式肩负起“北方镇山”的使命。唐代敕封其为“广宁公”，辽代成为王朝的“龙兴之地”。《全辽志·山川考》载：“医巫闾山为幽州镇岳，隋开皇间敕立北镇祠，唐诏广宁公，元敕贞德广宁王，明初定号山神。其祀典之隆，冠绝东土，胡汉共祀，礼秩兼修。”宋金元封为“广宁王”，至明清为“医巫闾山之神”。考古工作者在辽陵遗址发现的穹顶式墓室与中原形制的地宫并存，壁画中契丹射猎图与汉式宴饮场景交错，无声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深度。

在医巫闾山出土的渤海国遗物印证着汉唐文化的北传，契丹王朝在此更留下了深刻印记。辽代九位皇帝中有三位长眠于医巫闾山，萧太后等数十位皇族陵寝墓群构成了庞大的地下文化景观。据《辽史》记载，辽太子耶律倍因喜爱医巫闾山的秀美风光，在山顶修建起北方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；辽圣宗曾亲自主持医巫闾山祭典，并命汉族工匠在各地修建孔庙，形成了契丹皇族“祭天与尊孔”的独特风俗。这种“胡汉共祀”的传统，

让萨满祭坛与中原礼仪在山间和谐共存。

尤为珍贵的是在北镇医巫闾山辽陵壁画中，契丹侍卫与唐风纹饰的共生，彰显了辽代统治者构建多元文化认同的政治智慧。这种双向的文化调适，为后世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女真与汉盟约背后的文化交融

1161年深秋的金代东京城，金世宗完颜雍举行了一场载入史册的祭祀。据《金史》载：“大定十一年始郊……天子亲祀……”此次郊天礼为史载金朝最为隆重的一次郊天祭祀，也是金朝第一次以中原礼制祭祀北镇医巫闾山。祭祀仪式的背后，是两种文明的精彩相遇。祭坛上，女真萨满摇动着缀满铜铃的神杖，汉族礼官则按照《周礼》的规范摆列玉帛。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正隆年间祭器中，一件鍍金银盘上的海东青纹饰与青铜簋的夔龙纹相映成趣，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对话。

这场祭祀开启了金朝制度创新进程。翻阅《金史·百官志》，可以看到完颜雍如何将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与唐宋官制熔于一炉。最引人注目的是科举考场的变化。据《金史·选举志》记载，新设的女真进士科要求考生既要通晓女真文字，又要精通儒家经典。1978年在黑龙江出土的《女真

进士题名碑》，斑驳的碑面上汉文与女真文并列，仿佛仍在吟唱着“华夷同风”的时代旋律。

北镇庙遗址中，考古发现的文物让这段历史变得触手可及。一件出土的金代石碑，碑头是典型的草原风格纹饰，下部则镌刻着中原风格的汉字布局。这种巧妙的结合，正如《大金集礼》中记载的礼仪改革，既保留了女真拜日的传统，又吸收了汉族祭天的礼制。《金史·文艺传》中“一代制作，能自树立”的评价，正是对这段民族融合历程的最好注解。

一场宴席成为汉蒙情谊的转折

1587年的辽东，长城外的春风刚刚吹绿了草原。在北镇城东三皇岭上的镇东堂，一场特殊的宴席正在举行。辽东总兵李成梁在此设宴款待蒙古部落首领，这不是史书中常见的“赐宴抚赏”，而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交流，更是边疆民族交往的生动实践。

宴席的布置独具匠心。汉式的八仙桌上摆放着蒙古族人喜爱的奶食，草原风味的烤全羊旁配着精致的江南点心。虽然没有后世传说的马头琴助兴，但《开原图说》记载的“夷人善吹笛，汉工能和之”，再现了当时音乐交融的场景。李成梁特意命人打造了一批特殊的餐具，银碗内壁镌刻着汉字吉语，外壁装饰着蒙古族人崇拜的

北镇镇山文化：一座圣山见证的民族交融史

□谢雷

雄鹰图案。

这场宴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促进了北镇马市的繁荣。马市的设立，深受各民族的欢迎。来马市参加贸易的人成群结伙，一次数十人，数百人，甚至上千人。马市不止买卖马匹，更多的是广泛的商品交易。汉人提供的商品多为粮食、盐、布匹、绸缎、铁锅、铁铤等；少数民族提供的商品有马、貂皮、人参、东珠等。可以想象，数百年前的辽西古道上的，熙熙攘攘的商旅如织，骡马成群，吆喝声、马蹄声、车轮声交织在一起，场面一定蔚为壮观。据《明代辽东残档》记载，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，是明朝任命的建州左卫的官员，经常组织本部百姓到马市进行贸易，业绩突出，数次受到赏赐。

马市的发展，印证了《全辽志》中“民夷杂处，各安其业”的记载。正如李成梁在奏折中所言：“夷夏之防，不若相资为用。”民族融合的工程，往往就藏在这些日常的交往细节之中。

清代皇家祭祀体系中的民族融合新章

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秋，乾隆皇帝在东巡盛京途中，于九月庚戌（10月19日）亲临医巫闾山北镇庙举行祭礼。《清高宗实录》详细记载了这一重要仪式，乾隆皇帝在《御制诗集》中留下“敬谒桥山大典昭，旋輿

跸吉祀寅朝。提封于昔无元北，望秩而今溯有姚。庙古百王虔盛享，神庥亿载佑全辽。高低黍稻盈幽野，岁岁颺祈风雨调”的诗句，道出亲祭的特殊意义。

此次祭祀展现了清廷独特的文化包容政策。现存北镇庙的“乾始神区”铜制匾额即为当年御赐。据《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》记载，乾隆皇帝特别将阐述民族政策的《御制喇嘛说》赏赐给随行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。祭祀仪式严格遵循《大清会典》规制，主祭坛陈设太牢，陪祭台则摆放蒙古王公敬献的整羊，体现了“因俗而治”的治国智慧。

这次祭祀开创了清帝亲祭北镇庙的先例。据《清仁宗实录》记载，嘉庆皇帝在1805年东巡时曾循例致祭。在北京先农坛和地坛，明代设立的医巫闾山之神位，清王朝继续一脉相承。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，直到清末民初，北镇当地仍保持着满、汉、蒙共同参与祭祀的传统，这种多民族共祭的模式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。

北镇镇山文化见证的民族融合智慧

激发信仰重构，构建超越族群的精神共同体。医巫闾山曾经历过不同民族的祭司在同一祭坛上各展其礼。契丹萨满的铜铃与汉族道士的法器共鸣，满族堂子的祭杆与汉传佛教的经



幅辉映。这种信仰交融不是简单的仪式叠加，而是在保持各自神圣性的同时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精神共识。当多种语言的祝祷声在山谷间回荡，我们看到的是超越族群的心灵共鸣。真正的精神共同体，不需要抹去差异，而是要让不同的信仰在对话中找到共鸣。

推动仪式创新，将政治智慧升华为文明共识。在北镇这片土地上，历史上曾经剑拔弩张的族群关系，往往通过一场精心设计的仪式得到化解。将政治盟约转化为神圣祭祀，把军事对峙升华为文化宴饮，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智慧令人叹服。仪式创新的关键在于，它用共同遵守的礼制替代了非此即彼的对抗，用文化共识消弭了族群隔阂。这种智慧至今仍具启示价值。解决矛盾可以避免压制，通过创造性的文化表达来实现理解与和解。

促进文化交融，创造多元共生的文明生态。北镇镇山文化交融，呈现出“和而不同、兼容并蓄”的鲜明特征。从混搭风格的建筑形制到多语并用的碑文铭刻，从饮食文化的创新融合到艺术形式的相互借鉴，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这里既保持独特性，又共同构成和谐共生的文明生态。这种文化交融不是简单的文化叠加，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有机融合。它证明了多样性不仅不会导致冲突，反而能够激发创新活力。

解码治理智慧，探索包容的文明秩序。北镇镇山文化蕴藏着东方治理智慧。先民摒弃强制同化与武力征服，转而以文化浸润、制度创新和情感联结，搭建起族群交融的桥梁。通过山岳凝聚精神认同，进而落实一系列举措，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，将“执两用中”的治理智慧转化为治理实践，实现不同族群和谐共生。面对文明冲突与治理困境的当代世界，这种包容开放的思维极具现实意义。它启示我们，真正的文明秩序应基于对话理解、制度创新与情感共鸣，构建尊重差异、兼容并蓄的治理体系。